

中国近代史丛书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4255

4

书
号

丁121

9

军政大学军事资料室

2 036 6586 3

中国近代史丛书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625 字数 48,000

1972 年 9 月第 1 版 1972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01—500,000

书号: 11·1·233 定价: 0.14 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一、列强的野心·····	1
二、“修约”交涉·····	8
三、“亚罗”号事件·····	13
四、广州之战·····	20
五、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25
六、《天津条约》·····	31
七、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36
八、侵略者重燃战火·····	42
九、沙皇俄国又伸出了魔爪·····	48
十、天津和北京的陷落·····	53
十一、焚掠圆明园的暴行·····	62
十二、《北京条约》·····	67
十三、战争的后果·····	72

一、列强的野心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了一次新的对华侵略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它们的罪恶目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基础上，夺取更多的殖民特权，以便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扩大中国市场，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美国和沙皇俄国积极支持英、法发动这场罪恶的战争，从中趁火打劫。

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元凶。

当时，英国已经霸占了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广大和富庶的地区作为殖民地。英国资本主义在残酷压榨本国人民和野蛮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它的工业生产已占世界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场”，它和它的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大发横财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继续获取巨额利润，加紧推行扩张政策，力图攫取更多的原料供应地、殖民市场和附属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兴高采烈，以为这一

可打开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只要中国人每人每年购买一顶棉织睡帽，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梦没有成为现实。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五五年间，英国每年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一直在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五十万英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一情况，使得英国殖民主义者大失所望。他们抱怨说：中国作为英国商品的主顾来说，还抵不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意大利或欧洲其他较大的国家。

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居统治地位。广大农民为了缴纳沉重的租税和维持全家最低的生活水平，除从事农副业生产外，还利用一切空隙，从事纺纱、织布及其他手工业。这种经济结构，顽强地抵抗着外国商品的侵袭。外国侵略者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破坏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这是英国商品对华输出额未能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妨碍英国工业品倾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严重破坏了中国财政和货币流通，从而直接排挤了其他商品的销售。

据不完全统计，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九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三万九千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四年间，增加到平均每年五万三千五百箱。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九年间，更激增为平均每年六万八千五百箱。英国驻广州领事包令，一八五〇年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的信中供认：“在英国

对华商务关系中，鸦片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所运用的资本，比对华贸易中任何其他部门的英国资本都要大。”这一点，到五十年代中期，就愈加明显，愈加突出。

这期间，英国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每年不过一、二百万英镑，而对华输出的鸦片总值，每年则达四、五百万英镑，以至六、七百万英镑。鸦片贸易是通过走私进行的，货款都必须用现金立即付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致使中国根本没有多少白银能用来购买大量的外国工业品。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①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仅就英印政府而言，它从垄断印度对华鸦片输出所攫取的纯收益，一八四二年以前就已达到每年少则几十万英镑，多则一百几十万英镑，一八四三年以后，每年增加到二百多万英镑，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六年间，更增至每年三百多万以至近四百万英镑，占印度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英国鸦片走私商，唱着“万物莫好过于鸦片”的颂歌，从中国装回一船船白银、蚕丝和茶叶。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急切地要求扩大中国市场，向中国倾销大量工业品，却绝不愿意通过放松鸦片贸易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既扩大中国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又保持鸦片贸易，曼彻斯特商会和商工协会等资产阶级团体，和以利物浦“毒品贩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四页。

子”为中心的鸦片走私商，早就催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他们硬说，英国工业品不能大量向中国倾销，只是因为他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中国沿海几个通商口岸，而他们的工业品通过中国内地，需要缴纳很多子口税。据此，他们要求在中国北方和内地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进一步降低中国的关税和子口税；要求派遣公使进驻北京，以便对清朝政府进行直接监督和控制；还要求扩大鸦片贸易，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用鸦片直接交换中国的农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使中国有更多的白银购买外国的工业品，扩大掠夺。他们认为，只要获得了这些条件，就可以继续扩大鸦片贸易，同时迅速增加工业品的输出，让英国工业品无障碍地直接进入中国各地市场，加速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市场。他们叫嚷，要使中国容纳和销售的英国工业品同整个欧洲一样多，不是每年两百万英镑，而是两千万英镑，即相当于当时英国每年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因为当时英国每年生产总值只有七千万英镑。他们还不断叫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发动新的对华战争，以达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英国政府正是秉承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旨意，一手策划和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显著发展。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六年，煤、生铁产量和进出口贸易额，都增长了一倍以上。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路易·波拿巴，一八五一年十二月通过政变攫取了政权，一八五二年自封为拿破仑三世皇帝。为了继续维持这种商业繁荣，延长自己的统治，他上台后不断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力图为大银

行家、大企业主、大投机商夺取更多的殖民地和市场。中国是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目标。

一八四四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法国对华商品输出有了一些增长。但是，绝对数还很小。那时，每年出入广州的英国商船有二百多艘，吨位合计九万多吨；而法国商船通常只有三、四艘，总共一千多吨。法国对华商品输出增加有限，从中国输入的丝、茶和其他原料，却大量增加。一八四四——四五年度，法国从上海运出的生丝是六千五百包，到一八五六——五七年度，已急剧上升为九万包，增加了十三倍。里昂由于大量输入生丝，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法国资产阶级对《黄埔条约》所给予的殖民特权，越来越不满足，强烈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好让他们的侵略魔爪自由伸进中国各地，扩大对华商品输出，掠夺更多的原料。野心勃勃的路易·波拿巴，早就打算派遣使节进驻北京，并为夺取增加通商口岸、开放长江、从生产地点直接购买中国货品等新的特权而诉诸战争。法国还企图从中国夺取进入内地传教的殖民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伙同英国一道出兵，是发动这场罪恶战争的又一个主要凶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怀着同样的侵华野心，自始至终积极支持和参与英、法的侵略活动。

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大大刺激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当时资本主义各国中，美国的工业发展和铁路增长速度，都居于第一位。但是，在中、美《望厦条约》订立后的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输出的工业品，却没有什

么增加。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八年，从美国输入中国的工业品，仅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三年这三年达到一八四五年的水平，其余年份都远远低于一八四五年。因此，美国侵略者早就处心积虑地谋求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为进一步控制和掠夺中国扫除障碍。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曾经馋涎欲滴地说：“只要中国整个内地都开放，中国就会成为美国工业品最有价值的市场，其价值将大于美国现在所能进入的全世界市场的总和。”正是怀着这一野心，美国侵略者在英、法发动的新的侵华战争中，积极充当帮凶。

沙皇俄国是英、法侵略者的又一个重要帮凶。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沙俄依然处在黑暗的农奴制度之下。农奴制危机一天天加剧，农奴起义不断爆发，严重打击了沙皇专制政府。沙皇政府为了维持在国内的统治，力图通过领土扩张和对外战争，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增加自己的权势，迫使国内人民无条件地俯首听命。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国内市场由于农奴制的束缚而十分狭窄，也迫切地要求夺取新的领土和资源。

沙皇俄国的侵略目标，在西部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在东部主要是中亚细亚和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为英、法、美侵略中国取得了殖民利益，沙俄也加强了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活动。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为了争夺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沙俄同英、法之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果遭到了失败，被剥夺了在黑海保有舰队的权利，向巴尔干和中近东地区的扩张，受到很大挫折。

在这以后一个时期,沙俄便对侵略东方倾注了更多的力量。

英、法、美、俄四个侵略者,相互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站在反对中国人民、加紧奴役和掠夺中国的立场上,出于共同的侵略利益,结成了暂时的联合侵华阵线。

二、“修约”交涉

一八四九年一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已发出战争叫嚣，狂呼：“战争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鼓吹要“正视”那些所谓“必然会使现状改变的纠纷”，“如果没有的话，就制造那些纠纷”，以便挑起战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目的。

这年三月，英国驻香港总督和驻华公使文翰，率领英国军舰，从香港闯进珠江，进行武力威胁，强行要求进入广州城。但是，他们遭到了广州人民的坚决反抗，阴谋未能得逞。当文翰逼近广州时，广州人民立即涌到珠江两岸，很快就聚集了十多万人。广大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站在最前列，刀枪林立，旗帜飘扬，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喝令他们立即滚回去。英国侵略者见形势十分不利，才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去，胆战心惊地在洋行门前张贴布告，严禁英国人入城。与利物浦“毒品贩子”有密切关系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闻讯后，大肆咆哮说：“不要让广州的高级官员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然而，英国政府也知道，轻易出兵，在同仇敌忾的广州人民面前，不一定能占到便宜，因此一面加紧战争准备，一面提出所谓“修约”的要求，企图以此实现扩大殖民特权的侵略野心。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该约一经批准，就不得更改。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也首先规定了“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这两个条约还曾分别规定，若要对某些条款作出修改，需待十二年以后。并且指明，这种修改只是因为各口岸情形不一，关于贸易等条款，将“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很明显，这种修改，只限于具体执行中的若干枝节性问题。英国侵略者抓住后两个条约中十二年后可以“筹议”对条约作某些修改这一句话，援引“一体均沾”的条款，宣称英国应享有同样权利，以此作为要求修约的根据。

一八五四年，《南京条约》签订满十二年，由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升为驻华公使的老牌殖民主义者包令，就联合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朝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英国提出的修约要点，是：一、中国内地及沿海城市全部开放，如不可能，则至少要开放杭州、温州、南京、镇江等江、浙主要城市，准许外国商船和军舰在扬子江自由航行；二、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贸易，制定所谓中国劳工向外移民的办法，使掠夺中国人口合法化；三、废除外国进出口货物通过中国内地时课征的子口税；四、外国使节常驻北京。美、法两国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分别要求在中国沿海地区开矿、捕鱼，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的法国传教士。显然，这根本不

是只对贸易等条款“稍有变通之处”，而是要订立一个更加严重、更加广泛的奴役性的新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已经沦为外国侵略者的走狗。但是英、美、法三国公使一下子提出这么多重大要求，使他们十分惊慌。他们害怕外国侵略势力逐步深入，会威胁和损害他们的统治，更怕外国侵略者日肆覬覦（音计余 jìyú），无厌之求，没有个底。他们希望继续维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现状，既不去得罪外国侵略者，也不轻易答应他们进一步的侵略要求。因此，对于英、美、法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他们的态度是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想敷衍搪塞过去。

英、美、法公使先在广州向两广总督叶名琛（音沉阴 chēn）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置之不理。六月，英、美两国公使到上海，又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约要求。怡良以各国通商事宜，向来归两广总督专办为借口，要他们仍然回广州协商。八月，英、美公使回到广州，伙同法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并要求同叶名琛面商。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借口公务繁忙，回避不见，并回复他们：没有必要对条约作重大修改，自己也没有对条约作重大修改的权力。三国公使不肯罢休，便联合再次北上，到上海向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要求。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英、美、法侵略者乘机以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为诱饵，向吉尔杭阿表示：若答应修约，就帮助清朝政府“平定反侧，安辑地方”。与江、浙买办势力勾结较深的吉尔杭阿，就向咸丰帝建议：“钦派资望深重之

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结果遭到咸丰帝的拒绝。清朝统治者并不是不想利用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是一来嫌所付代价太大，二来也吃不准，耽心外国侵略者这套甜言蜜语不能兑现，因此拒绝与英、美、法进行这笔交易。

外国侵略者不肯罢休，这年十月，英、美两国公使乘坐军舰到达大沽口外，要求到天津以至北京商谈修约问题。清朝政府认为外国侵略者驶近京畿(音机 jī)重地，虽以修约为名，但“其居心叵测，难保不暗藏奸诈，有意寻衅”，不愿意在天津或北京和他们谈判，只派了级别不高的几个官员，到大沽口去听取他们的意见，要英、美公使还是立即回广州去同叶名琛交涉。美国公使麦莲向美国政府建议，对清朝政府进行武力威胁，要求“三个条约国家——英、法、美——要联合他们的海军力量，封锁白河、扬子江、闽江及黄埔，一直封锁下去，到毫无限制地全面行使对华通商特权为止”。但是，当时英、法正在同沙俄进行克里米亚战争，腾不出兵力，加上太平军大举北伐、西征，节节胜利，使侵略者一时不敢采取断然的行动。统率美国军舰在远东一带从事侵略活动的美国海军将领培利，在获悉麦莲的建议后，就写信给他说：“依我看来，这个时候使用武力来威胁清朝政府，或者恳求该政府对于美国利益采取重要的政治行动，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也许一星期内的变化，就会使清朝政府覆灭，由该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概归无效。”因此，这些侵略者决定暂时把问题搁置起来，再等待和观望一段时间。

这次修约交涉,就这样结束了。

一八五六年,《望厦条约》十二年期满。美国侵略者在英、法侵略者的支持下,再次向清朝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要点是:三国派遣使节常驻北京;中国全境开放,准许三国无限制地前往通商贸易;全中国臣民信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在上海活动了四个多月。当巴驾还在继续交涉时,英国已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燃起了战火。巴驾于是停止交涉,立即赶回香港。

三、“亚罗”号事件

一八五六年三月，英、法、俄签订《巴黎和约》，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侵略者已有可能抽出较大的兵力，发动一场新的侵华战争。而清朝政府正在调集可以调动的一切兵力，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但没有将革命火焰扑灭，相反自身的军事、财政和政治危机日益严重。英国侵略者认为，燃起战火以便进一步控制清朝政府，从中国攫取更多殖民权益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走私船，从厦门来到广州，停泊在黄埔港。清朝负责水上查缉事务的水师上船检查，逮捕了隐藏在这艘船上的两名海盗和其他有嫌疑的十名水手。这件事，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本来与英国毫无关系。英国侵略者为了挑起事端，决意歪曲和利用这一事件。侵华急先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首先跳出来大吵大闹，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水师在船上捕人，是破坏了中、英条约。他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国水师上船检查时，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从而也

是对英国的侮辱。他气势汹汹地责令清朝官厅立即释放被捕的人犯，并向英国道歉。中国水师据理驳斥了巴夏礼的谎言，拒绝了他的蛮横要求。巴夏礼一面照会叶名琛，说这是一种“性质极其严重的侮辱，必须马上赔偿”，一面向英国公使包令报告，密谋借此挑起新的对华战争。

“亚罗”号是中国商人方亚明的船，船上的水手都是中国人。为了逃避本国法律的约束，从事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一八五五年九月方亚明曾将这艘船在香港注册，向香港英国当局领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执照。隐匿在这艘船上的海盗，就利用这张执照作掩护，在海上从事劫掠活动。一八五六年九月四日，他们还在兴宁县附近作案，抢劫了许多沙船。九月下旬，又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上，从其他海盗船上接受了许多赃物。由于那张执照九月下旬已经过期，“亚罗”号在它被搜查前六天，就已不再挂英国国旗。所谓侮辱英国国旗，完全是巴夏礼凭空捏造。包令对这些事实，也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他私下却无耻地说：“船当时不在我们保护之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接到巴夏礼的报告后，他就断言：“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一块踏脚石，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重要的结果。”在他的指使下，巴夏礼向清朝官厅提出更强硬的要求，蛮横地扬言：如果清朝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不作满意的答复，英国海军就将对中国船只采取行动。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个昏愦（音愧 kuì）、顽固的封建官僚。他对人民一贯极端仇视。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间，广

州附近各府县人民大起义，叶名琛下令“凡通匪者，不论过去现在，一律格杀勿论”，对广州附近起义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结果，仅广州城内就有十多万人被杀，广州附近被杀的有一、二十万人，致使广州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对外国侵略者，叶名琛则色厉内荏（音忍 rěn），表面上搭足架子，爱理不理，内心总是幻想外国侵略者发善心、讲道理，鼓吹什么“羁縻（音机迷 jīmí）外人之术，在使彼之理屈而我之理伸”。当巴夏礼提出蛮横要求、蓄意挑衅时，他先是行若无事，满足于照会往来，以为只要凭他在照会中讲清事实真相，就会使侵略者歇手罢休。当这一着无效，包令和巴夏礼一再威胁，并进而提出最后通牒（音蝶 dié）时，他又惊慌失措，命令将被捕的中国海盗与水手送交英国领事馆，结果愈加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巴夏礼一再节外生枝，借口照会写得不合要求，或所派的官员职位太低，拒绝接受。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英国军舰在海军头目西马糜各里指挥下，向广州进犯，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当英国军舰向广州步步进逼时，叶名琛仍以为这只是空言恫吓，自欺欺人地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他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禁止水师抵抗，等待侵略军自行撤退。英国侵略军乘机于二十九日分成几路攻进广州城。

美国侵略者一边打起“中立”旗号，一边全力支持英国军舰的进攻。停泊在香港的三艘美国军舰一齐出动，协助英国侵略军轰击腊德炮台。美国公使巴驾在写给包令的信中表示：“凡关系我们在条约下共同权利及利益的事情，我都完全

热烈地赞成。”并立即报告美国政府，要求赶快把舰队从美国派来，“增加我们驻中国的海军力量”。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英国侵略军一起发动了对广州城的进攻。

英、美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广州无辜的居民惨遭屠杀，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妻女被侮辱蹂躏（音柔淋 róulín）。总督衙门也遭到洗劫。美国驻广州领事在报告中写道：当广州城破约半小时以后，“我发现完全占有该地的英国人，包括军官、士兵以及水手，正在拿走一切为他们所喜爱的东西。”美国侵略者的行径，其实也不例外。法国代办顾随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曾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急速地抢劫总督的房子和妻妾”，美国驻香港领事早已抛弃了“中立”旗号，而抢着亲自把美国国旗插在广州城墙缺口上。

以叶名琛为首的清朝官吏吓得东躲西藏，广州人民和部分士兵则奋起杀敌，当晚就将这些侵略者逐出了广州城。英国侵略者当然不会就此歇手，他们继续不断地炮轰广州，进攻广州城郊和珠江沿岸各炮台，烧毁成千成万间民房。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州人民和爱国士兵更为坚决的抵抗。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八日，四只放火筏突然顺流而下，撞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使这艘军舰濒于毁灭。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艘英国货船停泊在港口，船旁忽然出现几个中国人，活捉了英国船长。十一月二十七日，一艘英国划艇满载从广州劫得的各种珍宝赃物，企图逃往香港，在虎门附近，突然遭到二百多艘中国划艇开炮拦击，好几个英国强盗当场被击毙、击伤，其余的连忙弃船逃走。英舰停泊的地方，忽而飞来火药瓶，忽而出现

水雷船，每夜都有中国小艇迫近进行袭击。侵略者处处挨打，昼夜不宁，陷入了困境，包令首先偷偷溜回了香港。十二月十四日，广州人民愤怒地烧毁了英、美、法商馆十三行洋楼，侵略者狼狈逃窜。一八五七年一月，广州人民斗争更加激烈，几百艘中国沙船和划艇，多次同时在各线出击，围攻英舰，英国侵略军只好后退，最后困守虎门一隅，等待从英国发来的救兵。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大哗，乘机煽动战争狂热。帕麦斯顿已由外交大臣转任首相，是一个最好战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接到“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他就施展编造谎言、欺骗舆论的惯技，歇斯底里地狂叫：“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同胞在地球上遥远的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强迫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泰晤士报》兴高采烈地说：“由于这次敌对行动的爆发，现存的各种条约就都作废了，我们大可按照我们的意愿自由自在地和中华帝国安排关系了！”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的地方都用不着提起。”美国报纸也跟着大叫大嚷，疯狂攻击中国。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对帕麦斯顿及英、美资产阶级报刊颠倒黑白的无耻叫嚣，进行了严正的驳斥。他指出：“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

诬蔑。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① 马克思以铁的事实，揭露了“亚罗”号事件的真相，并列举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商品走私、掠卖人口、无耻地欺凌中国人等等暴行，愤怒指出：“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②

当英国议会辩论对华战争问题时，上、下院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反对派首领得比等人，同样是一些狂热的侵略分子。但是，他们把揭露帕麦斯顿关于“亚罗”号事件的拙劣谎言，看成是乘机倒阁、取而代之的极好机会。因此，在议会辩论中，他们推出了若干真实材料，用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得比揭了帕麦斯顿的底，指出：“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英国议会中的这番争吵，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两派之间关于哪一种反革命手法更巧妙的争论，但是，就是他们自己在狗咬狗时揭发的这一部分事实，也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极端虚伪和无耻。经过五天激烈辩论，帕麦斯顿被击败，下院通过了对帕麦斯顿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帕麦斯顿这个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忠实爪牙、利物浦鸦片走私商利益的忠实维护者，立即宣布解散议会，重新

①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十三页。

② 同上书，第十四页。

大选，强行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同时，向法国、美国
和沙俄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压迫清朝政府签订新的
不平等条约。

法国在中国的宗教侵略活动，一向十分猖獗。一八五四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省西林县活动。他披着宗教外衣，勾结当地土豪、地痞行凶作恶，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一八五六年二月，当地官厅逮捕并处决了马赖。路易·波拿巴政府抓住这个事件作借口，早在九月就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派一支法国远征军到中国。因此，接到英国提议后，法国立即打起“为保护圣教而战”的旗号，与英国侵略者共同组成英、法联军，开往中国。

早在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侵略军进攻广州时，美国侵略者就已派遣军舰参战，由于国内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内战迫在眉睫（音节 jié），未能从国内增派兵力参加英、法联军。但是，它信誓旦旦地保证，将同英国“一致行动”。

沙皇俄国前一年还在同英、法打仗，这时见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便转而与英、法联合，对英国政府的提议，立即表示“欣然允诺”。沙俄侵略者一边加紧在中国边境的军事殖民活动，一边派遣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为驻华公使，乘军舰赶到上海，与英国驻上海领事一同策划所谓“联合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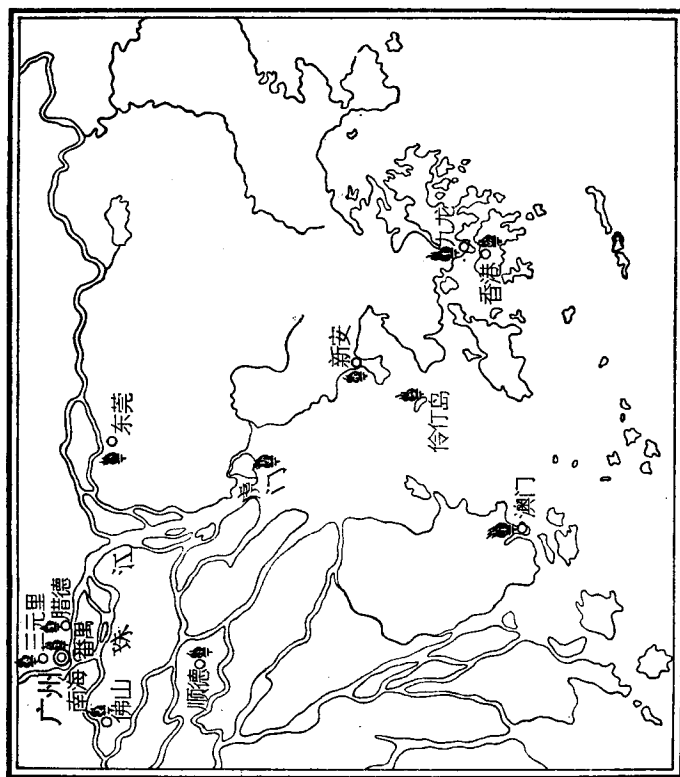
这样，英、法、俄、美结成了对华侵略集团，发动了一场遭到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严厉斥责的“极端不义的战争”。^①

^①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十四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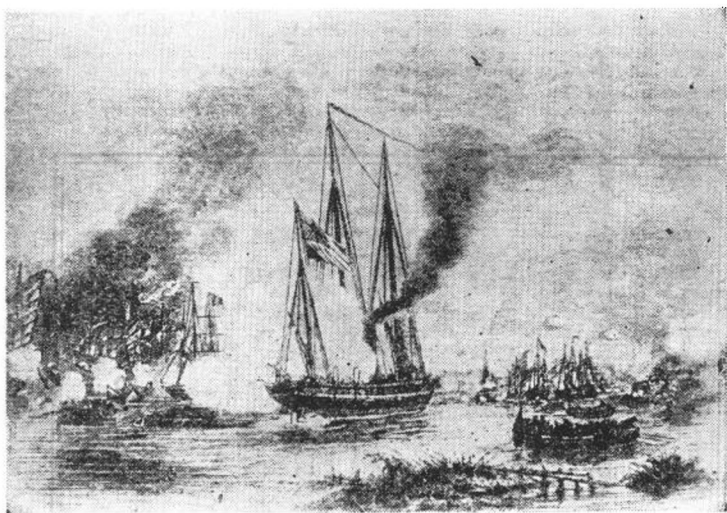
四、广州之战

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全权大臣、曾任牙买加和加拿大殖民总督的额尔金，率领英国陆海军到达香港。十月，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率领法国侵略军到达香港。十一月底，美国新派的驻华公使列卫廉乘美国快速舰，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乘俄国炮舰，也赶到香港。经过四国侵略头目的共同策划，十二月，英、法联军纠集起五千六百多人，再次扑向广州城。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国侵略军攻入广州城，当晚又从广州退出。两广总督叶名琛越发骄横自大，不可一世，以为这全是他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成效。因此，当额尔金和葛罗率领英、法联军前来进攻广州时，他就一一照旧办理。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叶名琛在十八小时内接受要求，否则就要攻城。叶名琛笑笑说：“彼故作战势，来吓我耳。我不与和，彼穷蹙（音促 cù）甚矣。”部将们见到侵略军进攻迫在眉睫，请求调兵设防，他不批准；请求招集广州市民组织团练，协同守城，他又不批准；请求派人到敌船上去侦察动静，他竟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敢有赴敌船者，按军法处置！”叶名琛自认有神明护佑，迷信降神扶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图



中国帆船、小艇与英国军舰激烈交战

乱(音机ji)。他对部下说:“乱语告以过十五日(即阳历十二月三十日)必无事。”因此,他对英、法侵略者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战守准备。

英、法联军利用叶名琛的不抵抗政策,顺利抵达广州城下。十二月二十八日拂晓,开炮轰击广州城,连续滥轰达二十七小时。尽管广州爱国官兵与广大人民冒着枪林弹雨,顽强坚持战斗,当侵略军进城后,还继续在街道和屋顶进行狙击,但是,由于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竖起白旗投降,二十九日广州又一次沦陷。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后,便在广州组织以巴夏礼为首的所谓“联军委员会”,让卖国投敌的原广东巡抚柏贵,在这个联军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下继续任职,充当他们

的傀儡。叶名琛畏葸(音洗 xǐ)地躲藏在一座花园中,被英、法侵略军捉住,送到香港,不久后又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他恬不知耻地自称“海上苏武”,吟诗作画,一八五九年死在那里。当时,人们曾讥讽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在英、法联军的铁蹄下,广州遭到了比上一年更加野蛮的蹂躏和摧残。英国侵略军一攻进广州城,就从广州布政使衙门抢走库银五十二箱,共二十二万七千两。法国侵略军也到处抢劫,连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也挖苦他们有一种“专抢珍贵细软的奇怪本领”。

在强敌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广东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三元里九十六村人民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一次举起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正义大旗。他们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打击汉奸,实行坚壁清野,大义凛然地宣布:只要侵略者敢于来犯,就“格杀勿论”。他们英勇击退侵略军的巡逻队,又粉碎了侵略者的走狗劝说他们放下武器的阴谋,使侵略者望而生畏。番禺(音潘余 pānyú)、南海、顺德、东莞(音管 guǎn)、新安等县人民,也纷纷起来自卫。广州城郊人民,每到夜间,便不断施放火箭,射进城里,惊扰敌人;城内人民,则经常三、五人预先埋伏在要道口,等侵略军经过时,突然出击。他们还在侵略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挖陷阱,埋窝箭,不断给予打击。曾经身历其境的俄理范,在他的《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日本记》中,心有余悸地写道:“要认出谁是敌人而谁不是,那确实很困难。山野间到处是人,注视着我们的行动。自然可以设

想，每个村民在心理上都是敌人。”

一八五八年六月初，东莞人民向侵略军发出挑战书。巴夏礼亲自率领一支一千多人的侵略军前往骚扰，东莞人民预先埋伏在树林中和僻静小道上，待侵略军进入伏击圈后，齐出截杀，一举歼敌数百人。侵略军纷纷逃窜，陷在水田的淤泥中，拔不出脚，狼狈万状；巴夏礼也跌下马来，几乎被俘。这年六、七月间，广州周围群众武装力量几次逼近广州城，甚至攻上广州城垣，冲进城门，给侵略者以很大杀伤。盘踞在广州城内的英、法、美侵略者，非数十人不敢出动，风声鹤唳（音利 lì），胆战心惊。不得不放弃广州新城，龟缩在广州旧城内。

港、澳爱国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在外国人机关和家庭中服役的两万多名中国雇员和工人，一齐罢业抗议。

早在一八五七年五月，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满腔热情地介绍了中国人民自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侵略军进攻广州以来的斗争事迹时，就已明确指出：“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这一评价，适用于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页。

五、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额尔金离开伦敦前，英国政府就曾授权给他，如果清朝政府依然拒绝提出的要求，就可以将军舰开进白河，对清朝京畿重地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胁迫“解决一切争执事宜”。

沙皇俄国和美国这两个侵略者，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积极支持英、法联军北上进攻京、津。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为额尔金和葛罗出谋划策说：“除去对北京直接施加压力之外，对中国政府没有其他办法。而使这种压力生效的最好手段，莫过于将吃水较浅的军舰径直开进白河。”他并指出，五、六月天气晴和，气温适中，是在北直隶湾（今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好时机。美国公使列卫廉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说：“我坚信联军的做法是必要的，同中国人友好交涉，什么也不能得到。”

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英舰十多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北上，陆续到达白河口外。

当舰队尚未集中完毕时，葛罗提出：为了争取时间，作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先向清朝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清朝政府派出全权大臣进行谈判，待战争准备完成，再寻借口使谈判破裂，立即进攻大沽与天津。

四月二十四日，四国公使各自发出照会，要求清朝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前来大沽会谈。英、法照会口气十分强硬，限令清朝政府在六天内答复，扬言“万一不能满足所提出的要求，必定采取断然行动”。俄、美两国则装出同情的样子，劝告清朝政府接受举行会谈的建议，于最短期间满足四国公使的要求，从而使“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普提雅廷得意地对列卫廉说：如果俄、美两国不同清朝政府公开破裂，既可帮助英、法满足欲望，又可博得清朝政府的好感，这样，必定能够“使关于美、俄两国利益的问题，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

清朝政府当时正将庞大的兵力集中在南方，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起义。它还十分耽心京、津一带前一年遭到严重旱、蝗灾害，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随时可能爆发起义。在接到英、法、俄、美的照会后，清朝政府明知这群强盗狼狈为奸，有的剑拔弩（音努 nǔ）张，有的装作和事佬，手法不同，目标一样。但是，它依然幻想利用侵略者手法上的差异，拉拢俄、美，争取法国，花费不太大的代价，与侵略者达成妥协。

赶到大沽口负责同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交涉的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在奏折中写道：“京、津一带，贫民失业，很容易发生暴动；东南沿海各省，都还没有平定；如果发生对外纠纷，必然要增添许多麻烦。现在既非用武之时，京、津又非用武之地。为了迁就大局，经过再三斟酌，想来还是拉拢俄、美，进而联络英、法，设法予以羁縻为好。”所谓“迁就大局”，就是顾惜清朝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谓“设法羁縻”，正是妥协投降的代

名词。这是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反人民、反革命的妥协、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份自供状。

但是，清朝政府对侵略者许多要求的疑虑，这时还没有消除。关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一项，清朝政府认为：“言似近情，心实叵测。来去自伊，贪得无厌，终有隐忧。”因此，一直不肯答应。关于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人随便进入内地通商、传教，以及减轻关税、子口税等项，清朝政府也都只肯答应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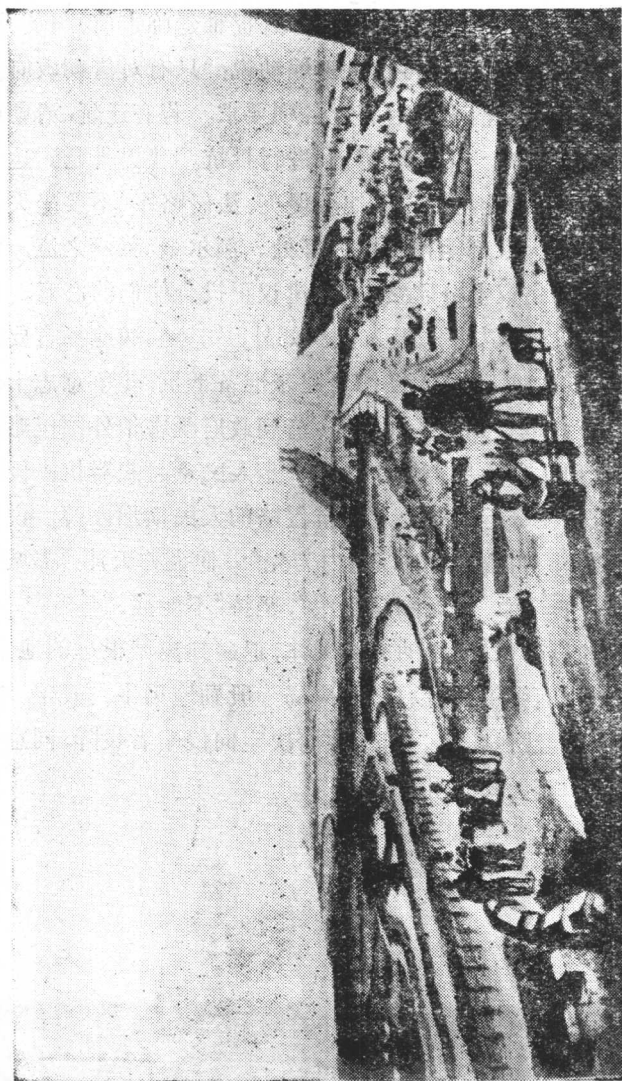
英、法侵略者见清朝政府还在吞吞吐吐，不肯立即答应全部要求，便忽而借口清朝官员没有全权资格，忽而借口清朝政府的复照写得不合规格，拒绝同谭廷襄等人直接会谈。同时，利用这段时间，仔细探测了白河口的水道、地形和大沽炮台的军事设施，加紧作好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

俄、美两国公使，在这期间一边继续为英、法发动武装挑衅打气，一边在“调停”的幌子下，不断恫吓和威胁清朝政府。沙俄公使往往一天朝清朝官员那里跑好几次，危言耸听，进行要挟。美国代表直到英、法联军大举侵略的前一天，还不动声色地照旧同清朝官员谈判。对于俄、美两国公使所扮演的角色，清朝官员也不是毫无察觉。谭廷襄等人在奏折中，曾多次说道：现在英、法公开进行威胁，美、俄暗中加以要挟，强弱虽有不同，贪得无厌则没有丝毫区别。特别是俄国公使，异常狡猾，一心想借英、法之力，牟取俄国私利。当时，英、法、美三国军舰都停泊在白河拦江沙之外，惟独沙俄军舰在“中立”的幌子下，开到拦江沙以内。谭廷襄探听到，英、法侵略军头目

每逢进口，都必定要到沙俄军舰上与普提雅廷会见，普提雅廷也常常前往拦江沙外英、法、美船上，去同他们密商，彼此联络非常密切。清朝官员曾以此推断，在英、法、美、俄四国之中，“大抵俄国公使为主谋，英、法恃强挟制，美国公使则两相依附，诡计多端，共同算计我国”。但是，清朝政府仍然没有放弃“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幻想，继续自欺欺人地把希望寄托在俄、美两国公使的所谓“调停”上，在军事上不加戒备，以致当英、法侵略军突然袭击大沽炮台时，措手不及。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日，英、法联军准备完毕，便于上午八时发出照会，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由英、法联军“驻守”。清朝政府拒绝后，上午十时，英、法侵略军就突然以数十只小轮船和舢板，闯进大沽口，攻击大沽炮台。俄、美两国船舰也驶进白河，为英、法联军助威壮胆。谭廷襄带头乘轿西逃，清朝其他重要官员也都跟着慌张逃走。广大爱国士兵和下级军官自动坚守岗位，英勇迎战，给侵略者以很大杀伤。当炮台被炮弹击中，里面的木梁燃烧起来后，他们仍然顽强战斗，决不后撤。炮台被毁时，爱国士兵纷纷从炮台奋勇跳下，冲进敌群。他们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吓得侵略者目瞪口呆。一群法国侵略军刚占领一座炮台，炮台就被中国士兵舍身炸毁，四十名侵略军不是葬身其中，就是受了重伤。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大沽口没有加紧设防，缺少后备兵力，双方力量悬殊，炮台终于失陷，大沽口被英、法侵略军占领。

大沽口炮台失守，使清朝政府十分惊慌。谭廷襄是一个与叶名琛同样昏庸腐朽、畏敌如虎的封建官僚，他连忙要沙俄



台 炮 沽 大 的 占 被

公使普提雅廷到天津进行“磋商”。普提雅廷临走前，与英、法侵略军头目共商对策，再次大肆煽动说：“只有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答应各项要求。若有迁延，清朝政府有可能在京、津一带部署防御，进行抵抗。”普提雅廷到达天津后，又写信给美国公使，要他敦促英、法侵略军“不要坐失良机”，说这样大家都能得到很大好处。额尔金、葛罗之流，对俄、美公使的建议十分欣赏，因为建议正投合他们的心意。五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郊外，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毁灭天津城。这时，天津人民纷纷起来准备抵抗，斗争意志十分高昂，侵略者也感到惊慌。可是，清朝政府既害怕外国侵略者攻占天津和北京，更害怕京、津一带人民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谭廷襄在奏折中对要求反抗侵略的人民横加诬蔑，说他们要“内变”，叫嚷“御外以靖内为先”。他谎称天津“郡城残破，内无一日之水，又无隔宿之粮”，坚持“不能战，不易守，不得不抚”的投降方针，自动放弃天津，退避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并指使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殷勤地用牛、马、羊、鸡、鸭等供应英、法侵略军。清朝政府决定向侵略者投降，同意派遣全权大臣到天津议和。

六、《天津条约》

一八五八年六月二日，清朝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分别与英、法、俄、美四国代表开始谈判。

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一面以英、法将发动新的武装进攻要挟清朝政府，一面又装出同情清朝政府愿意为它出力向英、法翰（音卧 wò）旋的样子，诱迫清朝政府最先答应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于六月十三日正式签字。美国侵略者运用同样手法，强迫清政府于六月十八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

与俄、美两国的“笑面虎”姿态不同，英、法两国代表自始至终态度极为骄横强硬，逼迫清朝政府立即接受他们拟定的所有条款，不但在项目上不准讨价还价，就是更改一个字也不容许。甚至连条约中文本的译文，也得由他们决定。他们还一再威胁要中断谈判，带兵去攻打北京。

桂良、花沙纳之流被侵略者的虚张声势吓破了胆，在奏折中惊慌失措地写道：现在听说他们陆续调来兵船不少，火轮船只围逼天津城下南、北、东三面，枪炮迅利，兵勇简直不能抵

挡。当时，京、津一带人民纷纷起来，自动抗击侵略者。一次，一个美国兵率领几个汉奸，闯进居民家中勒索，当地居民立即将汉奸捆绑起来，美国兵吓得抱头鼠窜。又一次，英国舰队头目登岸活动，被群众狠揍了一顿，丢掉了衣帽，狼狈逃回。广大人民坚持斗争，桂良、花沙纳之流却视为心腹之患，横加诬蔑说：“密查京畿地方，土匪均思蠢动，一旦决裂，大局不堪设想。”在另一份奏折中，他们更气急败坏地喊叫：“事机万分危迫，天津人情汹汹，若再拖延下去，不但外国人容易决裂，百姓恐怕也要发生变乱。”对外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对内敌视人民，历来是投降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清朝政府坚持镇压人民，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必然要妥协、投降、卖国，终于接受了英、法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在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分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四十二款、附约六款。美国侵略者借口“利益均沾”，又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增加了八款。英、法、美、俄四国还与清朝政府商定，于一年内互换条约批准书。

侵略者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大大扩张了在华殖民特权：

一、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原先，外国公使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与清朝地方官吏打交道，不能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早在一八五五年，美国公使伯驾就说过：“从遥远的地方无法驾驭中国政府，到了它的身边，它就会变得驯服多了。”外国侵略者就是要通过这一条款，直接控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中国的侵略活动。

二、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可以在各口岸自由居住、租赁房屋、购买土地、建造礼拜堂和医院，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这样，他们就可将中国沿海和沿长江的许多城市，都变成外国鸦片和廉价工业品侵入的据点，变成掠夺中国各种农业和矿业原料、手工业产品的聚集地，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到处伸张侵略势力。

三、外国侵略者的军舰，有权驶入长江和各个通商口岸。这就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沿海与长江的防卫，使清朝政府从此丧失军事上的独立，外国侵略者得以方便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

四、进一步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之间的所有纠纷，以及他们的一切刑事犯罪行为，中国官员都不得过问。涉及中、外两国人的民事案件，必须在外国人所属领事官的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实行所谓“会审”。实际上就是保证侵略者任意为非作歹不受惩罚。从此，在这张“护身符”的保护下，大批殖民主义者源源闯进中国，到处肆无忌惮地在政治上压迫中国人民，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资源，中国成了殖民主义冒险家的乐园。

五、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

《天津条约》还规定修改税则，由清朝政府派官员到上海会同商订。十月，清朝政府所派遣的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与英、法代表继续谈判。十一月八日

和二十四日，分别和英、法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十款，主要内容为：一、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改名“洋药”，二、一般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五的关税；三、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四、海关税务邀请外国人帮办。

关税是抵抗外国商品的竞争、保障民族经济的重要武器，同时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关税税率已经大大降低，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打击了国内工商业，影响了中国的财政收入。这次上海协定，继续确认了值百抽五的税率，对许多货物的税额作了调整，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比之一八四三年，又降低了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六十五。许多重要的外国工业品，如棉纱、斜纹布、印花布等，税率实际上都不到百分之五。这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协定还规定海关聘用外国人帮办，这就使海关更进一步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从此，外国商品就可以利用这种低税率，大量向中国倾销，摧残中国民族经济；又可利用这种低税率，大量掠夺中国资源，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同时，外国侵略者还可利用海关，控制清朝政府的财政，迫使清朝政府顺从。这次上海协定规定的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税率，又扫除了外国商品自由流转于中国境内各地的障碍，而中国商品在各个关卡都要缴纳沉重的厘金和常关税，根本无法与它竞争。例如，中国自己出产的煤所纳税款，比之进口的洋煤所纳的税款，要高出近二十倍；中国自己出产的糖，要比进口的洋糖多纳四倍的税款。这样，外国商

品就能够象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倾泻而来，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从此将遭到空前的障碍。

鸦片贸易在“洋药”的名义下被宣布为合法贸易，对此马克思评论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禁令而告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①

中、俄《天津条约》，条文虽比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为少，但其中规定：“日后中国若有优待他国通商等事，俄国一律享有。”所以英、法、美所掠夺到的一切侵华特权，沙俄也都实际分沾到了。通过中、俄《天津条约》，沙俄除原来陆路通商外，第一次取得了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各口岸通商，以及派兵船到这些地方停泊的殖民特权。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页。

七、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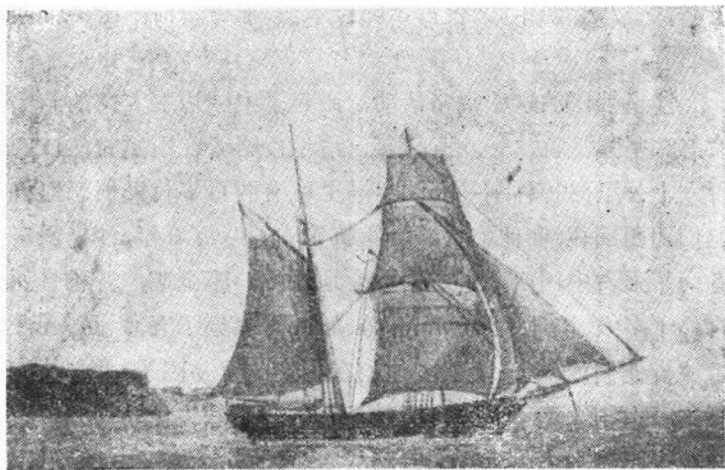
沙俄侵略者除了在天津趁火打劫外，还乘机在中国边疆地区加紧侵略活动。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英、美、法侵略者酝酿所谓修约的时候，沙皇俄国就已经加紧向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区扩张。

中、俄东段和中段疆界，早在一六八九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一七二七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中，就有了明确规定。但沙俄侵略者对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一直馋涎欲滴，早就想加以吞并。中国西部疆界在巴尔喀（音克 kè）什湖，与沙俄疆界本来相距很远，根本不发生交界问题。当沙皇俄国吞并了中亚细亚以后，对中国西北广大地区，也伸出了侵略魔爪。

一八四九年，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授意下，沙俄殖民主义冒险家涅维尔斯科伊乘“贝加尔”号，潜入中国黑龙江口与库页岛地区窥探。沙俄侵华急先锋、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写道：“可以断言，谁占有黑龙江口，谁就将领有西伯利亚。因为只要占有这个江口，那就掌握了这条江

上通航的钥匙;任何一个强国有了这把钥匙,人口日趋稠密和工商业日趋繁荣的西伯利亚,就将永远成为它的纳贡者和属地。”一八五〇年,涅维尔斯科伊一伙非法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口庙街,建立了以沙皇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为此,尼古拉一世亲自把勋章发给涅维尔斯科伊,狂妄地宣称:“俄国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升起来,就不应当再降下去。”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尼古拉一世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五月四日,又召集了专门讨论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御前会议。尼古拉一世仔细查看了远东地图,指着从尼布楚往东直至太平洋岸的大片土地,大声嚷道:“好,这应该是我们的了!”接着,他回过头来对他的陆军大臣补充说:“我们必须同中国人‘商量’这件事。”按照这个命令,沙俄军队便大规模出动,前来中国。



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船“貝加爾”号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穆拉维约夫亲自率领一个战斗步兵大队、一个哥萨克骑兵中队和一个山炮队，乘坐七十五艘汽船、驳船、木筏，闯进中国内河黑龙江，气势汹汹地沿江东下，经过松花江口和乌苏里江口，窜到黑龙江口附近活动。后来，沙俄侵略者又以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为名，借口要与英、法海军在太平洋上对抗，多次派遣远征军，强行侵入黑龙江，沿黑龙江北岸建立大批军人村屯、炮台和兵站，企图加以长期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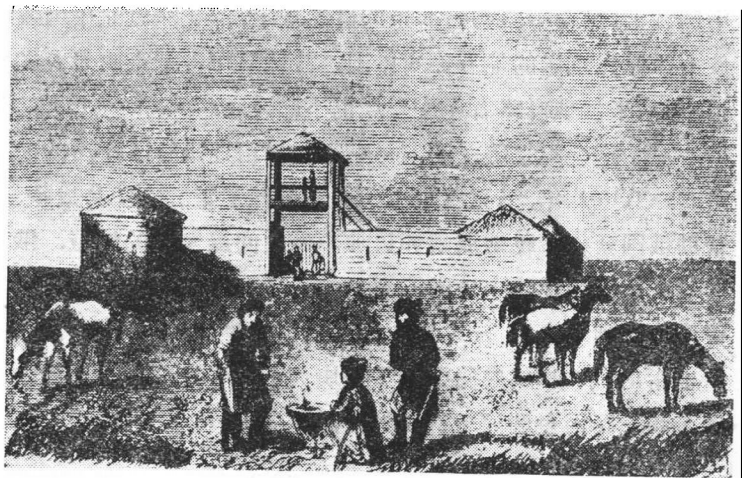
沙皇俄国在加紧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同时，还把侵略魔爪伸进中国西北，侵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七河（即爱克斯河、勒布什河、阿克苏河、宾河、喀拉搭勒河、库克乌苏河、伊犁河）地区，建立市镇和兵站。一八五一年，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为通商城市，加紧对中国西北进行渗透和侵略。一八五四年，又侵占了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

沙皇俄国的这些侵略活动，激起了中国边疆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强抵抗。一八五〇年，沙俄侵略者在距黑龙江口一百六十公里的特林刚一登陆，马上就有两百多村民愤怒地将他们团团围住，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一八五五年，沙俄侵略者为了强占中国西北塔尔巴哈台地区的一座金矿，开枪打死打伤十多人。当地人民愤怒万分，转眼就聚集了五、六百入，严厉谴责他们的暴行，烧毁了他们在当地的贸易圈子，并把他们赶走。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迫使沙俄侵略者不敢贸然在中国边疆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

英、法侵略者在广州和大沽口燃起战火，为沙皇俄国实现

霸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野心，提供了好机会。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①

一八五八年初，沙俄侵略者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了包括两万多名步兵和骑兵的庞大兵力。这年五月，穆拉维约夫率领沙俄军舰和侵略军到达瑗珲（音爱灰 àihuī），诱使清朝黑龙江将军奕（音亦 yì）山，与他“就边界事件相商”。在双方会见后，穆拉维约夫恬不知耻地声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沙俄船舰一再武装航行于中国内河黑龙江，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要塞，



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北岸建立的军人村屯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一页。

是为了所谓“帮助防范英夷”，不但有利于沙俄，也“有利于中国”。这个狂热的沙俄侵略分子，竟然以此为理由，强行提出要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作为中、俄两国东部国界的界河，要居住在江北的中国鄂伦春、赫哲、费雅哈等各族人民，迁往江南。奕山指出：中、俄两国分界，早经《尼布楚条约》规定，从来没有变动，无从更改。沙俄侵略者便在谈判席上大肆咆哮，当天晚上，又出动军舰，开枪放炮，进行武力威胁。五月二十八日，沙俄侵略者胁迫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所有中国领土，改为中、俄共管。沙俄借此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条约虽然规定，黑龙江以北中国各族人民原先屯居的地方仍属中国，沙俄只可占据空旷无人之地，但后来沙俄侵略者连这一点也不愿遵守。

对于这个不平等条约，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②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四—三十五页。

②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七页。

在中、俄《天津条约》中，沙俄侵略者还居心叵测地写上一条：“所有未定边界，由两国派员秉公查勘。”这是企图借勘界为名，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恩格斯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它的这一阴谋，指出：俄国“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①后来，在中、俄边界上，沙俄侵略者正是这样干的。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十九页。

八、侵略者重燃战火

《天津条约》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性条约，侵略者仍不满足，它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发展，更推动它们挑起新的侵略战争。

一八五七年夏，美国工业开始减产，接着就爆发了经济危机，延及英、法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引起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财政危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一八五八年整个一年都处在危机中。英、法、美等国生铁产量、造船吨位都大幅度下降，对外贸易指标也明显跌落。因此，扩大中国市场，加强掠夺，就成了英、法、美资产阶级用来解脱危机的重要手段。

《天津条约》墨迹未干，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御用报纸就在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为了使清朝政府更加俯首帖耳，将《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尽早兑现，并取得新的殖民特权，一八五九年初额尔金就已建议：在英国公使前往北京换约时，英国政府应当派遣“强大的兵力护送”，为此，应在上海集中“足够的炮舰”备用。一八五九年五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一到香港，就与英国

军事头目秘密策划，对清朝政府再作一次“威风凛凛的武力表现”。他们决定预先制造事端，作为借口。六月，卜鲁斯到达上海。这时，清朝政府已派桂良、花沙纳等在上海等候，与卜鲁斯会商进京换约的日期。可是，卜鲁斯根本无心和他们会商，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一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他拒绝与桂良、花沙纳会面，加紧准备庞大的舰队北上，并一再威胁说：对于任何可能发生的麻烦，中国政府必须负全部责任。蓄意再次用武力进行要挟。

法国侵略者同前次一样，紧紧追随在英国侵略者的后面。葛罗早就叫嚣说：“《天津条约》是在枪炮威胁之下迫使清朝政府接受的，也只有在暴力之下，才能使它付诸实施。”法国政府同英国政府一样，决心用枪炮来迫使清朝政府立即将《天津条约》全部付诸实施。

美国国内这时战云密布，内战就要爆发，但它在新的对华侵略中，仍不甘落后。在英、法公使到达上海之前，美国就已派了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赶到上海等待。会合之后，沆瀣（音巷谢 hàngxiè）一气，共同策划各种阴谋。

一八五九年六月十七日，英国军舰十五艘、法国军舰两艘、美国军舰三艘，一同到达大沽口外，借口进京换约，强行要求驶进白河。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阶级笼罩在一片忧心忡

仲（音充 chōng）的气氛中，他们耽心条约中关于外国使节驻京，长江开放，内地通商等条款，将影响清王朝的尊严，危害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曾想以“全免课税”作为代价，换取外国侵略者放弃这些条款。但是，在气焰嚣张的侵略者面前，他们甚至没有敢将这个意见明确提出来。为了防备外国军舰再次驶进白河进行威胁，清朝政府也采取过一些措施。早在英、法联军撤离天津后，它就下令修复大沽炮台，充实守卫兵力，在白河口打下大量木桩、铁钎（音枪去 qiàng），设置了障碍。

可是当卜鲁斯之流以武力威胁，强行北上时，清朝政府又完全屈服，答应立即同外国侵略者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再三表示：“上年所订和约，中国既许以互换，决不肯食言，致有变更。”为了防备外国侵略者重新夺取大沽口炮台，威胁京、津地区，勒索新的特权，清朝政府要求英、法、美三国公使在大沽口北部的北塘登陆，由清朝政府派兵保护，进京换约。清朝政府命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亲自到北塘迎接英、法、美公使，又命令沿途地方官吏备办供应，妥为照料，并在北京正阳门外预备宽敞房屋三处，作为三国公使的住处。

然而，英、法侵略者早已决定陈兵北京城下，勒索更多的殖民利益，因此一口拒绝从北塘登陆的建议，蛮横叫嚣：“定行接仗，不走北塘。”他们原定六月二十四日发动进攻，只是由于美国公使要求等待美国舰队一同参加，才把进攻的时间展延到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晨，英法侵略军头目、英国舰队司令贺布，亲自率领舰队闯进白河。他派三艘火轮逼近清军设在河中的障

碍，用绳子缚住铁钺前柱，然后用两艘火轮拖曳，先后拖倒十余架铁钺。其余军舰则排列在旁，耀武扬威，进行挑衅。守卫大沽炮台的中国广大爱国官兵，满腔愤怒，可是由于咸丰帝有“不要先开枪炮，以顾全大局”的禁令，只好看着侵略者横冲直撞，破坏河防，而不能出击。直隶总督恒福，这时还赶紧派遣官员拿着照会去见侵略者，再次劝说他们由北塘登岸换约。英、法侵略者拒绝接受照会，并突然开炮，向大沽炮台猛烈轰击。

中国士兵和一些将领在一再警告无效后，忍无可忍，被迫还击。领头的一只军舰，首先被打得动弹不得，许多船只被驱逐到浅水里搁了浅，不能进退，遭到抬枪、鸟枪、大小火炮从四面八方射击。侵略军的其余船舰连忙扯起白旗，表示投降，并起碇下驶。但一绕到被打毁的船只背后，就用这些船只作掩护，继续向炮台轰击。陆战队还企图冲上河岸，抢夺炮台。可是，他们一跳下船，就陷入淤泥滩中，成了中国士兵的活靶子，只好纷纷爬进芦苇丛中隐避。随同而来的美国军舰东奔西突，竭力将搁浅的英、法船舰拖到深水里去。美国舰队司令还命令美国水兵爬上英国军舰，代替被打死打伤的英国侵略者发射枪炮，帮助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英、法侵略军，逃出大沽口。

当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抬着饼面食物，不顾炮火纷飞，送到炮台和军营，鼓励爱国士兵奋勇杀敌。

激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深夜。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英勇自卫反击下，英国十三艘军舰中，被打得丧失战斗力的有

六艘，被打沉五艘，被俘两艘。英国侵略军一千二百人中，死伤近五百人。除了被英船拉回的以外，在岸上还抛下一百几十具侵略者的死尸。还有一名英国士兵、一名美国士兵被清军俘虏。英国侵略军头目贺布腿部受了重伤，他的副手则伤重丧命。法国侵略军的舰队司令被打伤。美国舰队司令所乘的快艇，也被打得粉碎。

这次大沽口之战，完全是英、法侵略者蛮横挑衅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末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① 马克思还义正词严地指出：“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问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②

大沽口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英、法侵略者狼狈向上海逃去。美国公使则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诡称他们在英、法与中国交战时，没有出过一个兵，没有放过一炮，在北塘与清朝政府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可是，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坚持镇压人民，极力阻止京津地区人民组织起来进行自卫，顽固地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在大沽告捷之后，咸丰帝立即命令恒福等探明英、法侵略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十六页。

^② 同上书，第四十三页。

者的动向,要他们对侵略者“乘机进行说理,希望他们悔悟,使安抚局面得以保全”,还特别关照:“如有可乘之机,恒福等绝对不可放过,这一点最为重要。”当英、法侵略军返回上海后,清朝政府又赶紧命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设法与英、法公使谈判。为了不使侵略者出丑,清朝政府竟命令何桂清等人,对于英、法“天津被创之事,不可漏泄”。同时,清朝政府还命令留下北塘口岸,不加设防,以便英、法公使登陆换约。

九、沙皇俄国又伸出了魔爪

英、法侵略者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引起了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争吵和混乱。英国资产阶级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英国的“利益”，为了英国在东方以及在欧洲的“威望”，必须对这场惨败“作出显著的报复”。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凶相毕露地叫嚣：“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去攻击并占领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到那里。”一八六〇年二月，英、法政府再次分别派遣侵华老手额尔金和葛罗，率领英、法侵略军开赴中国。

英、法联军的再次出动，得到了沙皇俄国的积极支持。

沙俄侵略者虽然从上次战争中攫取了最大的殖民利益，却仍不满足，又向中国伸出魔爪。《璦琿条约》签订刚半个月，穆拉维约夫就率领十多艘沙俄军舰，侵入中国内河乌苏里江，沿途强行登陆，测绘地图，在江边安设炮台，甚至还侵入松花江，进行骚扰。他们将海兰泡改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又将伯力改为“哈巴罗夫斯克”，以作为进一步扩张的新据点。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和掠夺，沙皇政府向新霸占的中国领土流放了许多犯人，还规定驻扎在这一带的水兵，凡服役已满十五年

的，便可退役，获得土地，并由政府负担费用，将他们的家属接来。沙俄政府宣布，除了罪犯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在黑龙江地区寻找宝石、黄金，企图以此吸引“移民”涌向黑龙江地区。从一八五九年起，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一带，格外加强了军事殖民和骚扰活动。穆拉维约夫曾多次派出俄国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强行驱逐中国官吏，移动界标。他自己曾直言不讳地供认：“现在我正下令，将全部中国官吏和哨卡都从乌苏里江右岸驱逐到左岸去，并命令将抗拒者用武力加以逮捕，押往瑗珲。”与此同时，沙俄侵略者还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新疆地区，搜集情报，妄图进一步侵吞中国西部领土。

一八五九年四月，沙俄代表与清朝政府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就提出要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清朝政府虽然不愿得罪外国侵略者，可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是清朝皇帝和贵族的故乡，是他们祖先世代居住，也是出产人参、貂皮的重要地方，因此对沙俄侵略者的荒唐要求，表示无法接受，并拒绝批准穆拉维约夫强迫奕山签订的《瑗珲条约》。

沙俄侵略者虽然想使用武力，但是大举兴兵，还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活动，受到了居住在当地的汉族、满族、赫哲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中国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中国边疆各族人民见到沙俄侵略者横行霸道，“无不志切同仇”。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守卫自己的乡土。当时，在乌苏里江以东以采捕为业的广大贫民，在短短两三个月

内，就设立了一百五十多座营房，组织了一万多人，准备随时抗击沙俄侵略者。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拿起柴刀、猎叉同沙俄侵略者搏斗。同时，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间，沙俄国内接连爆发了将近三百起农奴起义，反抗黑暗的农奴制度。沙皇在国内的统治摇摇欲坠，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大障碍。调集大批军队到遥远的中国，还有运输线太长、物质供应极为不便等严重困难。因此，他们一方面不顾清朝政府一再抗议，一八五九年五月后以海兰泡、伯力为侵略据点，不断派遣武装船队和所谓“勘察队”，侵入乌苏里江，在兴凯湖、绥芬河、琿（音魂 hún）春一带，占据地方，驱逐中国官吏，强立界碑，妄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另一方面，阴谋重演在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八年英、法侵华战争中趁火打劫的旧剧，怂恿和支持英、法再次发动新的侵华战争，从中渔利。

为了加强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沙俄政府特别委派了沙皇的忠实走卒、近卫军将领伊格纳切夫为公使，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到达北京。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几天之后，他向清朝政府提出所谓“续补条约”六款，要求重新勘分中、俄两国东部和西部边界，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滨以及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割归沙俄，并增加库伦、张家口、北京等地为对俄通商城市，以便让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伊格纳切夫一会儿花言巧语地说什么沙俄所要侵占的，是所谓“海岸空旷之地”，“于中国实无用处”，又说什么中国海岸线很长，将乌苏里江以东划归沙俄，沙俄可代为防备英、法，以保证中

国东海岸的安全；一会儿又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俄国与中国是近邻，有一万俄里的漫长的边界线，在必要的时候，必定能比其他海上列强，更容易给中国以猛烈的致命打击。”这时清朝政府刚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获胜，对于这些花言巧语和威胁言词，没有多加理会。

沙俄侵略者在北京进行的这一阴谋活动未能得逞，于是便加紧与英、法侵略者勾结。当英、法侵略军准备从欧洲启程的时候，沙俄政府向英、法政府递交照会，表示支持。并宣布为了配合英、法联军的军事进攻，与一八五八年普提雅廷的做法一样，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将力求避免在任何情况下卷入一旦发生的战斗。他仅限于扮演一个心平气和的见证人的角色，不加任何干涉，只有在他被要求提供友好的外交的帮助时，才作为例外”。沙俄政府在这个照会中，提出了继续维持和利用清朝政府，以镇压中国革命、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罪恶计划。照会还特别提醒英、法注意，如果战争导致清朝政府垮台，使中国“辽阔的领土上出现一种无政府状态，将极其不利地影响商业关系，还可能长时期地使它化为乌有”。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在长江下游有了新的发展，太平军连续攻克杭州、常州、无锡、苏州等重要城市，捻军和其他各地人民起义军也十分活跃。他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敢于同一切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这使沙俄侵略者十分恐惧，因此企图借清朝政府之手，来扑灭中国人民革命，以便于掠夺中国人民。沙俄侵略者还企图借此阻止英、法长久占领北京，以免在自己还没有来得及部署力量、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就

为英、法所霸占。

这时,英、法政府对沙皇政府的这个照会表示支持。他们也深深感到,面对着不屈不挠、英勇反抗的中国人民,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是十分困难的,倒不如继续维持和利用卖国的清朝政府。因此,英、法政府在发给额尔金和葛罗的训令中,一再提醒他们:一定要坚持使清朝政府答应道歉、换约和赔款,但要注意保持清朝政府的统治,否则中国的“无政府局面”,将有利于太平军和各地人民起义军的发展,而不利于侵略者自己。

一八六〇年四月,英、法侵略军占领舟山,五月底六月初分别侵入大连湾和烟台。额尔金和葛罗则窜达上海。六月十五日,伊格纳切夫从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沙俄护航舰也从欧洲驶达这里。六月十六日,伊格纳切夫同英、法侵略军头目会见,声明对他们侵略远东的政策,“愿以极诚恳的态度表示同情”,并将在北京搜集的许多重要政治、军事情报,详细告诉英、法侵略者,怂恿他们早日进攻北京,对清朝政府“用武力狠狠地教训一顿”。六月二十六日,伊格纳切夫又主动向英、法侵略者提出,自己先去北直隶湾,进一步了解情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并同停泊在那里的沙俄军舰会合,以便“当盟国在北直隶湾采取军事行动时,能够使俄国舰队列阵于英、法舰队附近”。

十、天津和北京的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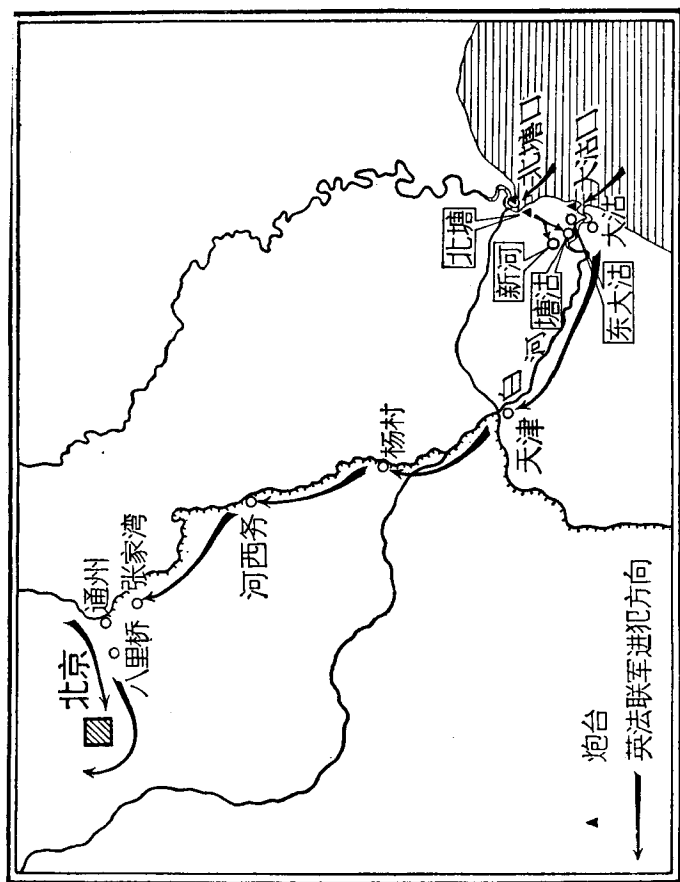
一八六〇年七月底，英国出动舰船一百七十三艘、侵略军一万零五百名，法国出动舰船三十三艘、侵略军六千三百名，闯到大沽口外。

先期到达的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率领四艘军舰到处活动。他们在北塘以上岸购买食物为名，刺探沿岸设防情报，发现北塘毫无戒备，没有设置任何障碍，便建议英、法联军乘隙首先进攻北塘。

已经换约完毕的美国公使华若翰，也赶到大沽口外进行窥测。鉴于英、法通过侵华战争所取得的殖民特权，美国根据“一体均沾”的惯例，照样可以同享，而美国国内南北战争又正在激烈进行，所以他在大沽口外没有继续等待下去，先行折回上海返国。

八月一日，英、法军舰三十多艘，由沙俄侵略者引路，乘潮开到北塘河口，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北塘镇。

八月十二日，英、法侵略军一万多名，从北塘进攻新河和军粮城，途中遇到了中国骑兵。中国骑兵只有三、四千人，拿着马刀等旧式武器，与侵略军比较，众寡悬殊。但是，他们没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侵犯京津图

有听任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是分成两路，勇敢迎上前去，同一万多名用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军展开激战。中国骑兵分成小股，避开猛烈的炮火，冲向侵略军，一气夺得大炮三门。在这一场激烈战斗中，许多骑兵都为保卫祖国领土、维护民族尊严，献出了生命。英国侵略者经受重大的损失后，才占领新河和军粮城。侵略者不得不承认：爱国的中国士兵是相当优秀的骑兵，他们是非常勇敢的。

八月十四日，英、法侵略军进攻塘沽，也遭到中国军队英勇抗击，侵略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官兵打得“很壮烈”。一些阵地上炮弹如雨下，而中国士兵仍然坚守阵地、奋勇冲杀。但因为守军阵地过于突出，英国侵略军一从侧面进攻，就难以守卫，最后被迫撤出。

八月二十一日，英、法侵略军从陆上由后路包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主要工事面对着海上，向陆一面，除了薄墙外，没有别的屏障。但是，自恃有优良火力的英、法侵略军，也没能轻易得逞。仅为了争夺北岸大炮台，激烈的战斗从下午五点钟一直延续到深夜。下午六点半，炮台内的弹药库中弹爆炸，炮台大部分崩塌，中国士兵仍然屹立不动，侵略军一次又一次架梯爬墙进攻，都被杀退。直到晚上十点半，北岸大炮台才失陷。

当侵略军正在为进攻南岸炮台将受到更大损失而发愁的时候，贪生怕死的直隶总督恒福等清朝大员，借口“北岸炮台既失，南岸炮台孤立难守”，强令大沽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的白旗，把南岸炮台拱手交给侵略军。接着，他们又下令撤走天津

所有军队，听凭侵略军进入天津城，并为他们张罗住食供应。清朝政府又派投降卖国老手桂良等人到天津，会同恒福一齐与英、法侵略者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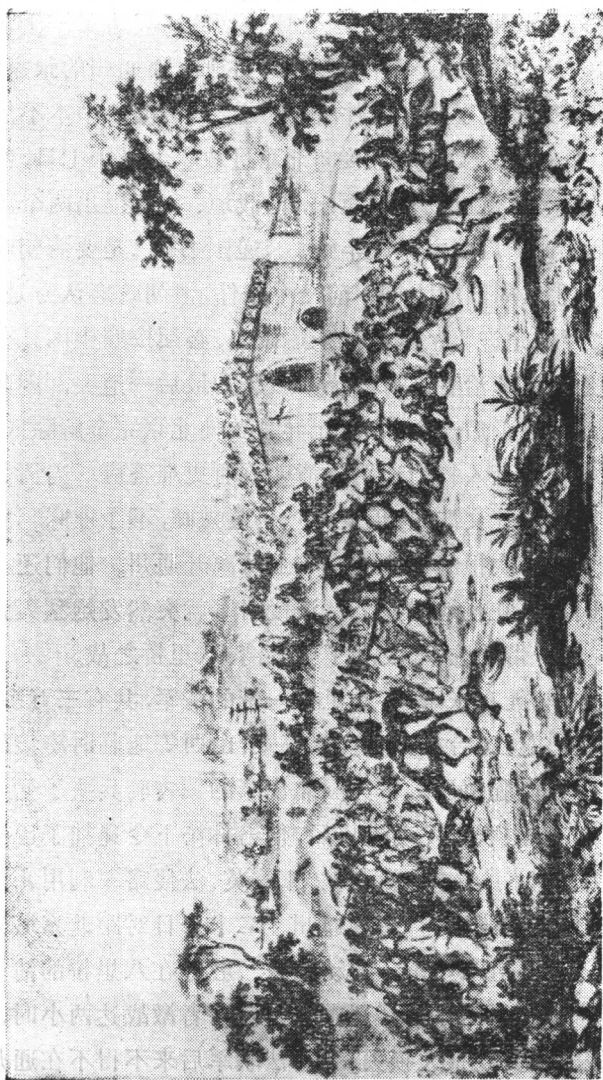
谈判开始后，英、法侵略者向清朝政府提出：除了全盘接受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外，还要接受增加赔款、进京换约、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新的条件。伊格纳切夫极力怂恿额尔金和葛罗，提出一种使清朝政府不能接受的条件，以便使谈判破裂，借口进攻北京，好掠取更大的殖民利益。因此，所谓谈判，实际上是英、法侵略者以进攻北京作要挟，不断提高价码，进行新的勒索；而清朝政府为避免英、法侵略军向北京进犯，一步一步退让，答应新的勒索。这是一场极其可耻的交易。

九月二日，桂良、恒福答复额尔金和葛罗，表示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拟了一份条约草案。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以桂良、恒福谈判的权力不够为借口，悍然中断谈判，向通州进犯。他们宣称：在到达通州之前，决不再作任何谈判。清朝政府力图阻止英、法侵略军前进，一面斥责桂良、恒福不会办事，一面赶紧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全权钦差大臣赶到通州，要求英、法联军撤回天津，在天津谈判，以解决全部问题。九月十三日，载垣、穆荫照会英、法侵略者，表示完全接受他们提出的各项条件，只要求英、法联军到达河西务就停止前进，不要再向北京进逼。并同意额尔金和葛罗各率一小队非武装的护卫至通州会谈，确定条约各款，然后前往北京换约。九月十四日，额尔金又节外生枝，

派巴夏礼到通州，提出：英、法公使在换约时要各带一千名侵略军作卫队，英、法联军并要一直前进到紧靠通州的张家湾。载垣、穆荫又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是，英、法侵略者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他们所需要的是直接向北京进攻。九月十七日，额尔金、葛罗再次派遣巴夏礼到通州，向载垣、穆荫提出两个新的条件：一是到京后要面见咸丰帝，亲递国书；二是要清朝政府立即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前一个条件，清朝政府认为是“国体所存，万难允许”，坚持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这是封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威严的最后一道关，因此还不肯迁就。至于后一个条件，无异是要使北京完全解除武装，为侵略者长驱直入扫清道路，清朝政府更难答应。当清朝官员试图同巴夏礼交涉时，巴夏礼竟伪装熟睡，不予理睬。第二天，巴夏礼再次拒绝谈判，率领卫队离开通州。他们还没有走出中国军队驻扎地时，英、法侵略军就突然发炮猛轰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驻军，发动了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当时，驻扎在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清军，共有三万多人，大都是从黑龙江、吉林、察哈尔、直隶、山西等地临时凑集起来的，由曾经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蒙古骑兵头子僧格林沁率领。英、法联军发动进攻后，僧格林沁下令逮捕了巴夏礼一行，并将他们送往北京。十八日，英、法侵略军利用密集的枪炮，首先攻陷张家湾，占领通州。二十一日对距北京城只有八里的入京要道八里桥，发动总攻。驻守在八里桥的清军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勇猛还击，与侵略者激战达两小时，使英、法侵略军受到很大损失。英、法联军后来不得不在通州停

八里桥大战



留半个月，等待从天津增援的兵员和军火，进行补充。但是，八里桥终于失陷。僧格林沁之流骑马抢先撤退，冲乱了自己的队伍，造成很大混乱，正好被英、法侵略军所利用。这一仗之后，从通州通往北京的通道，就被打开。

当英、法侵略军日益向北京进逼时，咸丰帝曾发一道“上谕”，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音踏 tà）伐”。但这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只不过是為逃跑制造烟幕。紧接着，清朝大臣就根据他的示意，上奏阻拦，说什么“虽天威所临，海氛自应慑伏，然非万全之道也，臣等以为断不可轻于一试”。这出双簧演出之后，咸丰帝就不提“亲征”，而在“巡幸”的名义下，率领后妃和一些大官僚，逃奔热河（旧省名，包括今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和辽宁西南部）去了。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音欣 xīn），则被命令留守北京。伊格纳切夫这时一面加紧威胁清朝政府的代表，说英、法联军意在覆灭清王朝，如果清朝政府同意批准《璦琿条约》，答应沙俄在“续补条约”中提出的各项要求，沙俄就愿意帮助清朝政府；一面又将沙俄教士秘密绘制的北京详图，送交英、法联军，继续煽动英、法联军早日攻进北京。当时，英国侵略军将领奥勒古十分满意地说：“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将军正在我们的营帐里。他已将一份我从未见到过的最好的北京地图借给我们，这张地图比我们自己的地图要好得多，非常详尽，他把所能提供的全部情报都告诉了我们。”北京城墙高大，城内还有好几万清兵，侵略者估计不容易攻破，于是，就提出要占领北京一个城门，让他们自由进出，作为议和条件。奕訢无耻地答应了侵略者的

这一要求，十月十三日英、法侵略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北京实际上沦陷。这完全是清朝政府昏庸腐朽、投降卖国的结果。

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在侵略者侵入天津和北京时，纷纷拿起武器，到处打击敌人，再一次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九月间，天津王兴邦、隋登初等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焚毁侵略军的船只，打死打伤好多侵略军。北京西郊距圆明园十里的地方，有一个谢庄，当地群众大都是猎户。十月，英国侵略军一队约一百多人前来侵犯。谢庄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的率领下，坚守在石砬（音债 zhài）、土堡后面，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英国侵略者不甘心失败，第二次又派五、六百人，拖着大炮前来进攻，企图一举将谢庄轰平。冯三保的女儿冯婉贞，才十九岁，集合全村青少年猎手，商量说：“西洋人的长处是有枪炮，利于野战，短处是害怕逼近的肉搏，而这正是我们的长处。我们村子周围十里都是平原，与他们比枪炮，哪能打胜？不如以我所长，攻敌所短，拿着刀剑和盾牌，同他们肉搏。”她的意见，得到所有青少年猎手一致赞同。他们便赶紧埋伏在离村四里的一座树林里，当侵略军走近时，突然杀出，一直冲进敌人队伍中间，和他们混战在一起。英国侵略军无法使用枪炮，不得不匆忙插上刺刀迎战。冯婉贞率领青少年猎手挥舞刀剑，奋勇冲向敌人，所向披靡（音迷 mí），侵略军很快乱成一团，败退下去。冯婉贞高喊：“兄弟姐妹们，敌人想溜！他们想跑远了，然后用枪炮来围攻我们。千万不要放过他们！”青少年猎手斗志更旺，勇猛扑向敌人，全村群众也赶

来支援，一直血战到傍晚，击毙了一百几十名侵略军，其余的丢弃大炮，乘着天黑，狼狈逃走，从此再也不敢来谢庄。

谢庄人民的斗争，有力地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一切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谢庄人民的斗争也充分说明，卖国的清朝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卖国政府，英、法侵略者是不可能放肆到那步田地的。

十一、焚掠圆明园的暴行

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起，就兽性大发，根据他们的军事头目所下的洗劫中国城镇、村庄的命令，屠杀劫掠、焚烧奸淫，无所不为。

十月六日，英、法联军闯进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圆明园周围三十里，是一座华丽无比的大花园，是专供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清朝皇帝奢侈享乐的别宫。清朝统治者从全国人民身上搜括了无数财富，集中了难以数计的人力、财力、物力，大规模经营这座花园和别宫一百五十多年。这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铁的见证，是对封建王朝腐朽寄生的罪恶，最有力的暴露和控诉。圆明园，又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园里各种精美的建筑，是中国封建时代建筑结构的精华。圆明园藏有各种无价的珍宝、罕见的典籍、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因此又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壮丽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这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历代人民无比杰出的艺术创造力。

英、法侵略军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大肆抢掠。他们象一群恶狼，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侵略者无比贪婪的本性。军官们

有所谓“优先权”，首先分批进去大肆劫掠。英国侵略军军事头目格兰特起先下令：每个军团的一半军官上午去抢，中午回来，让其余军官下午去抢。接着，全体侵略军都奉命进去“自由抢劫”。这群明火执仗的强盗，把园里凡能搬动的金银珠宝、精美丝绸、珍贵文物、各种艺术品，以及所能抢到的一切，统统掳走，自己背不动，就赶来大车和牲口搬运，你争我夺，转眼口袋里就装进价值巨万的贵重物品。英国陆军带兵官赫里斯，第一次抢到一个缕金的花盆，金缕之间有用白色珊瑚琢成的文字。盆中栽着一株高约一英尺的黄金树，树枝上悬挂着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子。除此之外，他又抢到一枚皇帝用的玉玺（音喜 xǐ）、一只嵌镶着许多宝石的大表和很多卷上等质料的绸缎，总共装了七筐，叫人替他抬回军营。第二次，他抢到一座七英尺高的金塔和其他许多东西，找了七个士兵替他运回军营。仅这一座黄金塔，就值到二万二千多英镑。法国侵略军也不稍逊于他们的同盟者。据葛罗自己供认：在抢劫圆明园后，“一个士兵口袋里有了二万、三万、四万、甚至一百万法郎，……据说一名团指挥官的珍珠和金刚石，就值八十万法郎以上。此刻天津的景象是乱哄哄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兵士在出卖成匹的丝绸、珠宝、翡翠花瓶和无数贵重的东西，这些都来自圆明园，总值至少达三千万法郎。”

这些强盗，把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拿不动或来不及拿的，便加以彻底破坏。许多极其精美的丝绸织品、瓷器、古铜器、象牙雕刻、珊瑚屏风，……都被他们任意撕毁、打碎和践踏。额尔金在家信中招供说：“劫掠和蹂躏这个地方，已够坏



被侵略者焚掠后的圆明园

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坏。原来总值一百万英镑的财产,我敢说五万英镑也不值了。”《泰晤士报》随军记者在从北京发回的通讯中写道:“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得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音发郎 fàláng)瓶,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活画出这些侵略者极端野蛮、凶恶又极端贪婪、无耻的丑恶嘴脸。

然后,为了消灭罪证,额尔金下令将圆明园全部烧毁。十月十八、十九日,三、四千名侵略军一齐出动,在圆明园内到处放火,使圆明园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大火连烧了三天,烟云弥漫,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这座世界名园和无数珍贵文物,被侵略者化成一片灰烬,只剩下一堆败瓦颓垣。

接着,侵略者又劫掠和焚毁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的许多著名建筑,及其中所珍藏的大量金银珠宝、历史文物。

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英、法资产阶级政府直接唆使和支持干出来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早就策划使清朝皇帝“遭受某些公开的屈辱”,从而使他在侵略者面前永远胆战心惊,不敢稍有抵触。为此,帕麦斯顿还曾耽心什么“额尔金对待中国人过于温和”。他批准额尔金烧毁圆明园的暴行,并对此表示“衷心高兴”,甚至叫嚷如果北京城内的皇宫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会“同样十分高兴”。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都分得从圆明园抢去的赃物,英国女王得到美丽的大珐琅瓶一对、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音户 hù)一块,法国皇帝得到了一块同样的朝

笏。英国侵略者还抱怨说：许多东西准备留给女王的，都被法国人抢去了。

英、法侵略军的暴行，受到他们国内广大群众的强烈谴责。连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学家雨果也说：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而辉煌的博物馆。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他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篋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抢劫和烧毁圆明园，集中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极端贪婪、野蛮和残暴。老奸巨猾的英国侵略者和他的伙伴，在嘴上、在官方文书上，总是充满了“仁义道德”，喧嚷什么侵略中国是为了维护“文明”、“正义”、“人道”。刘少奇一类骗子也跟着叫嚷，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是传播“西方文明”到达“落后的旧世界”。在圆明园和其他各处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充分说明这些殖民主义者和他们走狗口中的所谓“文明”，就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蹂躏和灾难，而他们的所谓“正义”，就是强权、霸道和血腥的炮舰政策，所谓“人道”，则是疯狂的抢掠、野蛮的屠戮，把亿万人民变成供他们敲骨吸髓、榨取脂膏的奴隶！

十二、《北京条约》

战争最后以清朝政府分别和英国、法国、沙俄签订《北京条约》告终。

在《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扮演了极为可耻的角色。十月十五日，他匆匆从通州赶到北京安定门外英、法联军行营，与英、法侵略者密商，决定先以“中立”的身份进入北京。他说此行的目的，一是“由我亲自作出判断，看看在目前中央政权处于混乱的情况下，是否还能指望于现政府”，也就是确定清朝政府是否还能充当他们的走狗；二是对清朝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以促使它来和法兰西及英吉利的使者进行肯定的谈判，并使该谈判具有迄今尚未有过的诚意。”对于沙俄自己所要谋求的卑鄙目的，则没有说。在密商中，他还建议联军头目早日进驻北京城，并和他们商讨了给清朝政府最后通牒的措词。

十月十六日，额尔金将最后通牒交给奕訢，胁迫奕訢在二十日上午十时以前，用书面答应下列条件：给英国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在中国狱中死去的英国俘虏的抚恤金，于二十二日交付；二十三日签订“续增条约”，并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否

则，英军就要夺取北京城内的皇宫，并采取其他措施。葛罗也提出类似的通牒，要求给法国抚恤金二十万两白银。额尔金在通牒中又说什么：广州虽由英、法占领，但关税仍在征收，继续供清朝政府使用；上海是靠了英、美、法的武力，才没有为太平军所攻陷；联军虽然控制着白河口和海面，仍然让到北京来的漕运船与进贡船往来无阻。暗示清朝政府，只要答应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甘作他们的奴才与走狗，他们不但不会颠覆清朝，相反将致力于保持清朝的统治，支持它镇压中国人民。

同一天，伊格纳切夫进入北京城，进行紧张的阴谋活动。他在密信中详细告诉额尔金和葛罗：清朝政府的显贵们，在咸丰帝离开北京后，都已四散逃亡，“帝国的摄政王以及由皇帝特别指定来进行外交谈判的重要官员，由于联军逼近北京大门而吓得晕头转向，均在北京城外。”怂恿英、法侵略者坚持强硬态度。与此同时，他又对奕訢的代表表示，愿意担任“调停人”，但需要清朝政府正式提出请求，并承认沙俄前一年在所谓“续补条约”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恬不知耻地将侵略说成“友谊”，对奕訢派来的官员说：“如果一些强国不进行干涉，强迫英、法撤军，那么，外国鬼子就会占领你们的国家。俄国很愿意为中国效劳，因为它一向对中国很有好感，而俄国所要求的报偿，只不过是一些对中国毫无价值的边境领土。”接着，他又面目狰狞地威胁说：“要知道，俄国有强大的陆军，现在俄国的海军已经逼近北直隶湾，中俄国境毗（音皮 pī）连，俄国对中国要塞的进攻，毫不费力。”声称清朝只有答应解决所谓“中俄悬案”，按照他的旨意去与英、法联军“交涉”，“北京方可挽救，

清朝皇统方能维持，危局方能挽回”。

十月十八日，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一群卖国贼，在沙俄侵略者的大肆恫吓下，为了保住清朝的统治地位，无耻地同意批准《璦琿条约》，并同意等到与英、法媾和之后，就与沙俄签订新约。伊格纳切夫于是声明出来“调停”。

沙俄侵略者所谓“调停”，其实就是要清朝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法侵略者的最后通牒。伊格纳切夫危言耸听地对奕訢说：“中国现在既然无力抵抗，对联军的要求，非接受不可。”同时沙俄侵略者又在“调停”的幌子下，从英、法侵略者那里获得以下保证：答应中国赔款可用关税作抵，暂为缓付；和议一成，英、法联军就撤兵；不毁坏北京皇宫；英、法公使迅速入京签约，入京时所带卫兵，每方不超过二百人。沙俄侵略者谋求这些保证，完全是从它的殖民利益出发，它想单独控制和操纵清朝政府，不愿英、法在北京保持过大的势力，更不愿英、法联军长期待在北京。它还害怕为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而即将签订的“续补条约”，事先为英、法侵略者探悉，受到阻挠。

清朝统治者从侵略者的态度中看出，投降侵略者，他们的腐朽王朝不但可以照旧维持下去，而且有可能依靠侵略者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起义，使摇摇欲坠的统治重新稳定下来。这时，京、津一带人民正在拿起武器，同外国侵略者斗争。北京城内的人民群众，也在酝酿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可是，恭亲王奕訢在他的奏折中却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指太平军与捻军）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音帚页 zhǒuyè）之患也；英国志

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清朝统治者这一伙民族的败类、国家的蠹(音矛 móu)贼，他们早已撤去了民族的界限，宁可俯伏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接受侵略者的要求。

十月二十二日，奕訢将白银五十万两分送给英、法侵略者，作为“恤金”。英、法侵略者又突然增加了割让九龙司等条件，以奕訢为首的卖国贼，不敢稍有异议，也完全接受。

十月二十四日，中、英《北京条约》签字，共九条。十月二十五日，中、法《北京条约》签字，共十条。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二、开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四、割让九龙司给英国；五、赔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筑教堂；六、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

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为了防止英、法阻挠和干涉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续补条约”，便对额尔金和葛罗说：“北京气候严寒，白河几天内就要封冻，联军如不立刻撤退，势必就要整个冬天留在北京，这对联军来说，显然是受不了的。”催促英、法侵略军早日退出北京。同时，他又再三警告奕訢，和沙俄的谈判必须严守秘密，避免被英、法知道。

十一月一日，法国侵略军首先退出北京。九日，英国侵略军也退了出去。十四日，伊格纳切夫与奕訢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共十五条。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所有的大片土

地，由《璦琿条约》中的所谓“共管”，变为同黑龙江以北一样，割归沙俄，只留下原先中国人的居民点及渔猎之地，“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俄国人均不得占”。同时，将中国西部疆界说成未经划定，规定此后应顺山岭、大河等重新划定。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沙俄侵略者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领土，强行霸占，又通过这个条约和后来在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划入了沙俄的版图。沙俄侵略者通过这个条约，还攫取了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等项特权。

美国国内这时南北战争正打得激烈，驻华公使华若翰已先期回国，没有签订新约。但是，《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各项殖民特权，美国侵略者都可依照“利益均沾”条款分享，所以同样十分得意。

十三、战争的后果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严重的。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半殖民地化加深了。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霸占了中国领土九龙司。特别是沙俄，它通过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十足的野蛮和无耻结合在一起的反动政策，趁火打劫，到一八六四年共霸占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土。这是对中国主权空前的蹂躏，对中国和亚洲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一八六一年，英、法、美、俄各国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及掌握中国海关的外国税务司，通过奕訢等卖国贼，紧紧控制清朝政府，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扶植和利用清朝政府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和走狗。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三年间，英、法、美等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一页。

国除原先在上海开辟的“租界”外，又先后在广州、厦门、天津、镇江、汉口、九江、上海等地开辟或扩大“租界”。在这些“租界”中，实行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系统以外的殖民地统治制度，借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清朝政府，及其在各地的统治机构。清朝卖国政府也进一步投靠外国侵略者。一八六一年冬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办理投降买办事务的总机关，第二年又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分驻上海（后移南京）、天津，管理南北各口岸通商事务，卖力地为外国侵略者奔走效劳。

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通商口岸由原先的五个扩大为十六个，分布于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奉天（辽宁）、江西、湖北等十省。沙俄在中国新疆和蒙古，增开了陆路通商城市。外国侵略者还获得遍及沿海和深入内地各处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特权。同时，关税和内地转口税税率大大降低，外国船只可以驶进中国内河，鸦片贸易和掠夺华工成为合法化。这就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得以横行无忌地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放手用鸦片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对中国民族经济进行直接的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和鸦片输入都急剧增加，很快就充斥中国各地。一八六四年，中国进口总值已达到一亿七千万美元，其中鸦片为六千六百万美元，棉织品、羊毛和毛织品为三千六百万美元。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占最大比重，合计一亿四千万美元；其次是美国，为九百五十

万美元。与此相应，外国侵略者从中国掠夺的农产品和其他原料也急剧增加。一八六四年中国出口总值为一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其中丝及丝织品四千三百六十万美元，茶叶、茶砖一亿零四百万美元，原棉二千五百万美元。从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由于外国商品、特别是棉织品大量倾销，洋纱逐渐代替了土纱，洋布逐渐代替了土布，洋袜、洋巾、洋烛、洋铁也都逐渐代替了中国土产，中国的棉纺织业和其他工场手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农民们被迫放弃作为家庭副业的棉纺织业，转而到市场上去购买洋布。同时，由于外国侵略者大量掠夺中国农产品，农民被迫改种各种经济作物，把粮食、棉花、茶等投入市场，这样，就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把中国农村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物，在经济上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贫困和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过去只准外国侵略者在五口设立礼拜堂，自行礼拜。《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中国内地，以宗教为外衣，加紧精神侵略，麻醉中国人民，同时利用宗教从事间谍和其他各种阴谋活动。

此外，外国侵略者还通过将他们的军舰开进长江和中国沿海各地，出售军火给清朝政府，帮助清朝政府兴办一些近代军事工业，从军事上控制清王朝，并因此可随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武装干涉。

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全面地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清朝政府已经完全拜倒在资本

主义侵略者的脚下。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使不平等条约迅速全部兑现，保持清朝政府的统治与中国市场的稳定，迫切要求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在签订《北京条约》的宴会上，法国公使葛罗就宣称，他们停泊在中国各口岸的船舰、士兵，都愿听从清朝政府的调遣，用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沙俄公使对奕訢表示：愿派水兵到江南，与清朝陆军合作，共同进攻太平军。英国使馆的威妥玛对奕訢说：“一旦真诚的外交关系(!)开始，我们就可以给你们任何援助，我们公使就可以立刻给你们任何援助。”从此，外国侵略者有的替清朝政府训练军队，有的赠送和出售枪炮军火，有的派船帮助清朝政府运兵，有的派军舰助战。清朝政府也死心塌地投靠外国侵略者。卖国贼曾国藩便说：“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实别无良策。”从此，中外反革命势力紧密勾结起来。英、美侵略者在上海组织所谓“洋枪队”，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直接出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英、法、俄、美四个资本主义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由于分赃不均，矛盾很快尖锐起来。特别是沙俄侵略者，两次在“中立”“调停”的幌子下，大肆耍弄阴谋，除攫取了与英、法、美同样的殖民特权外，还霸占了接近于两个英国和两个法国领土面积总和的土地，使英、法、美侵略者极为眼红和恼火。英国外交大臣气得大骂：“象俄国这样，用极其方便而狡诈的手段，获得那么肥沃的土地，在世界上实在难以找出第二个！”从此以后，这些侵略者在争夺中国市场中矛盾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英、俄两国，在亚洲长期角逐、争夺霸权的斗争，更加激化



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之下，是更加艰苦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屠刀下牺牲。但是，灾难吓不倒中国人民，先烈们的血没有白流。相反，却唤醒了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